

# 以物观人，感受历史深处的温度

作为文学之都，南京始终是重要的书写对象，葛亮是最新的代表人物。和身在南京而书写南京的作家不同，葛亮和南京之间有着足够远的距离。这种客观上的距离一方面保证其远观甚至俯瞰的视角，同时也保证了对南京的写作热情不会被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琐碎破坏。但“书写南京”似乎只是一个起点，由此出发，葛亮可能会走向更为深远的历史深处，并且与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进行呼应。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葛亮就其写作内外的物事展开对谈。

对  
话

的敬重，可与之平坐论天下。这也是对以女性为内核的另一种历史气象的尊重。

从“人”本身的角度去懂得

李黎：而从《北鸢》到《瓦猫》，你的写作范围又进一步扩大，从历史事件的写作，进入到历史元素的写作，写历史中的人、手艺、精神气和价值观等等，可以感觉到你写作扬帆出海的状态，那么接下来一个阶段，你的写作会朝什么方向努力？

葛亮：我近年会比较关注“非遗”的题材，在大学中的研究方向也与此相关。遗留态的历史，是我们探讨物和人的关系——“以物观人”，非常重要的窥口。这是一个系列性的创作计划，需要做大量的田野和案头。《瓦猫》这本书，算是一个阶段性成果，聚焦于“匠”。匠是承载手艺的人，也是物的造就者。当初开始写这本书，内含感情因素，救护祖父的手稿是个重要的因由。看到手稿时，觉得颇为疼惜。《颜氏家训》里那句“先有缺环，就为补治，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。”令人感怀，并心有戚戚，就引在《书匠》一篇的开首。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救护的过程。也就知道了“补治”的价值和意义。实际涵盖的细节比我们的想象，要丰沛得多。一本书的修复其实是很繁复的工程，大概需要“溜口、闷水、倒页、钉纸捻、齐栏、修剪……”二十多道工序；因为又有写《北鸢》龙师傅时带来触动，因而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想法。我陆续采访了大约十几位匠人，选择其中三位来写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地域的代表性。第二是覆盖了不同的界别，对于时代的折射，各自有其意义和特出之处。第三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点构思，因为当初写这本书，是读到诗人辛波斯卡的《博物馆》，其中有一句，“金属，陶器，鸟的羽毛，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。”我深为这句话触动，这便是“物”的意义。岁月静默，唯器能言。所以，我将之作为密码对应三则小说最重要的物象。分别是金属剪刀，陶制瓦猫和古籍修复师除渍的羽毛扫。我请插画师，以此为题材分别画了篇首题图。相信读者看到，也会会心。这个写作计划，我希望能够延展下去。关于“非遗”的好故事很多，是很值得让更多读者了解的。不光是从“匠”的角度，更是从“人”本身的角度去懂得。小说是个很适合的载体。如果我可以为此尽一份力，是很荣幸的事。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李黎：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，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，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游群星闪耀时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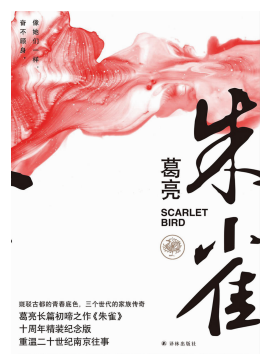
李黎

VS



葛亮

原籍南京，现居香港。作家、学者。著有《北鸢》《朱雀》《七声》《戏年》《问米》《瓦猫》等。曾获“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”“中国好书”奖、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大奖、年度中版十大中文好书奖等。



《朱雀》葛亮 著  
译林出版社 2021年5月

## 用写作拓展南京的文化轮廓

李黎：在准备这个对谈过程中，我越来越期待能用特别通俗和放松的方式和你对话，因为对你创作的学术阐述已经很多，再结合你的大量文本，导致了一个印象，就是你成了书写历史，尤其是南京往事的代言人，文本越来越清晰而个人形象越来越模糊。这是一个作家的荣耀，但考虑到你还特别年轻，“一颗老灵魂”之外应该还有当下的和世俗的生活才对。所以能否聊聊你的日常生活，“作家葛亮的一天”怎么度过？

葛亮：称为家乡的代言人，实不敢当。这多半也是来自读者的厚爱。南京这座城市太丰富了，我的小说只可作为管窥一斑的文本。“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”，这是金陵的旧时风雅。它也有它的现代与“烟火气”，有它的变动不居。家乡写作界的同行们，都在不断完整和拓展着这座城市文化轮廓。尤其2019年被评为“世界文学之都”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在外的南京人，很感自豪与欣喜的消息，同时也觉得实至名归。动笔写《朱雀》与《七声》时我二十多岁，如今二十年过去了，已不算年轻。我很庆幸能将这段时光用于书写南京，既是为家乡文学一尽绵薄，对我本人亦是重要的青春纪念。

有关我的日常，其实是简单而规律的。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教书。教学、研究和公务构成了平日工作的常态。其他时间就会用作阅读和写作小说。周末会运动和做一些其他的事，比如看电影和展览。当然，去年开始的疫情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规律。但因为已有一段时间，也形成了新的节奏。因为面授课程取消，会在家给学生上网课，我需要熟练地运用zoom、moodle等网络平台进行交流，也构成了另一种我们需要适应的现实。当然也有一些良性的变化，因为减少在外用餐的机会，厨艺也进步不少。

李黎：今年是你的第一部长篇《朱雀》出版十周年，纪念版也已经推出。从《朱雀》到《北鸢》，再回顾《朱雀》，这似乎是一个深入持续书写南京过往的过程，一路往前，也不乏重复和回顾，这其中应该有很多的辛苦？

葛亮：从《朱雀》《七声》到现在，我或许持续在寻找表述这座城市新的方式。乡情是一个写作者恒久的感情，如佳酿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弥醇。离开南京在香港生活，城市气韵的差异感曾经给我带来写作与表述的动力。当年我还是个年轻的写作者，试图去洞穿这座城市“三百年间同晓梦”，确实是有难度的。其间做了大量的案头与访谈，聚焦于人，我相信有温度的写作资料准备形态，才可能带来文字本身的温度。这次十周年版，其纪念的意义，在于对这十年书写家乡城市的总结，也是某种青春的纪念。所以我特地写了一篇新序《重行》，仍是聚焦于人，或者说在城市空间与风物中的人。时移世易，这座城市在变，近年越发呈现出一种年轻态的现代气象，是可喜的，也

是值得在未来的创作中表现的。同时变中有常，是这座城市的根基，也仍有许多可挖掘的空间。这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并不会让人感到辛苦，而会带来一种对于家乡情感的保鲜度。一座生活过二十载的千年古都，仍然会令一个写作者感到好奇，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，大概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。

## 方言的使用有一个微妙尺度

李黎：你特别喜欢使用两个字作标题，从有据可查最早的一篇文章《紫色》，到著名的《朱雀》《北鸢》，再到全新的《瓦猫》都是两个字。我干脆汇总了你所有的两个字标题的作品：《琴瑟》《迷鸦》《退潮》《七声》《阿霞》《老陶》《赌局》《浅白》《大暑》《泥戏》《英雄》《龙舟》《家书》《间谍》《过客》《金婚》《旧闻》《童僧》《离岛》《戏年》《英珠》《绘色》《颱风》《威廉》《逃逸》《街童》《云澳》《抓周》《青衣》《少年》《浣熊》《鹤鹑》《旅店》《新年》《书衣》《问米》《照相》《不见》《湖岸》《祖先》《洞穴》《海上》《小双》《巫问》《纸上》《暮色》《暂借》《罐子》《朱鹮》《摄影》《父亲》《春色》《书匠》《飞发》。这里有小说有散文，也有作品集的书名，整体看下来有种洋洋大观的感觉，既有古典意象又有现代社会的火热，更是充分呈现了汉语的魅力，寥寥两个字，背后的气象让人神往。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一喜好？作为一个远离南京又在深入书写传统的小说家，语言问题对你意味着什么？

葛亮：有了。对于语言，相信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感受与心得，这会构成写作风格的一部分。传统汉语的审美，其价值在于“言未尽而意已达”，有很大的审美空间在其中。我曾分享过，早期阅读受到父辈的引导。由笔记体小说进入，《世说新语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耳新》，乃至方言写就的《何典》，无不以精谨的语言勾勒耐人寻味的叙述场景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逐渐建构了我对中文审美的标准。借用建筑师凡德罗曾提出的一个观点，less is more。我想好的语言也是一样，以少胜多。而且我一直觉得中文小说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并不矛盾，甚至遥相呼应。如中国有迹可循最早的短篇小说出自《孟子·离娄章下》，区区几百字，已完美涵盖了现代小说评估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元素，甚而包括“后设”叙事部分。所以就小说而言，古典和现代是可相互转化甚而互动的概念。此外，就作者个体而言，语言风格也非一成不变。就我自己的体会，我会寻找合适的语言配合文本的题材和书写取向。《朱雀》是一个外籍游子对故乡的躬身返照，暗含了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，这一点不仅是主题，也势必包含在语言的表达上，有一些陌生化的试探的部分。《北鸢》的基本叙述场景是近代历史向的。如何去表达和还原时代，这种还原也需以语言作为砖瓦，甚而有一些接榫和铆合处。为此我看了大量的民初小说，去寻找和实践行文的语感。当小说完成后，收到的反馈说明这种寻找是有意义的。我目前在写的小说涉及岭

南文化发展的脉络，在地感是进入其历史肌理的桥梁，这一点也和语言切乎相关。我尝试将有代表性的粤方言元素加入现代汉语结构，去塑造整体的叙事。当然这需要以不牺牲读者通畅的阅读体验为前提。关于写作中的方言运用，多年前我与苏童老师有过一次对谈，谈及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。这无疑是一部经典，但以苏白作为基础叙述语言，还是影响了其在普遍读者中的流传。方言的使用，有一个微妙的尺度，用得好了对文本整体叙事有激活之功，失却分寸也可能过犹不及。

## 通过女性角色传达和呈现历史

李黎：我认为你或许是有史以来来写女性最好的作家之一，但诸多关于你的评论中，这一点似乎提及不多。逻辑上也不难理解，你作品中的古典精神和东方美学，包括对历史本身的呈现，很多是通过女性角色传达出来的。而以爱人、母亲为代表的形象也特别符合你们关于古典与东方的想象，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葛亮：过奖了。其实将女性写得很好的作家不少的，各有千秋。这和本身的生命体验有关。我很敬重家族中一些女性长辈。我曾在《北鸢》中写到主人公文笙的母亲孟昭如，人物原型是我的太外祖母。她是孟子的嫡传孙女，本名昭儒。我外公对母亲的教养方式记忆深刻。这种方式不同于父系所成。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，讲究的是各安其位，是社会性的所在。而女性天然有一种包容和宽阔，柔化了这种社会性规约。一如我在小说所写，身为“亚圣”后人，她“有种被中国大小圣贤造就的纯真”，但同时，她又以一种柔韧的方式，稀释了儒家所强调的伦理纲常。关于这种宽阔感，我们不必上升到“地母”等概念性的表述。其实这就是一套独立的历史运作体系，来自民间与日常。所以当以女性作为观照历史的着眼点，其审美的基底是放松的，因为往往以家庭作为基本内核来进行叙述。母亲会是天然带着暖意的角色，除了孟昭如，我曾在《朱雀》里写过程云和这个人物。这个形象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。风华正茂、旧日芳华有之，在艰辛岁月中，面对苦难，其生命韧性的延展度和包容力亦令人动容。这里所谈及的女性气质，或许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论述。女性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去中心化的，尤其是去除“菲勒斯中心”，是倾向与男性壁垒分明的。而在我看来，女性论述的意义更指向对话。比如孟昭如的姐姐昭德，嫁与直隶总督奉系军阀石玉璞。当石与政敌所困，不得其解，昭如说道，“你造出了时世，就莫怪时世造出他这个英雄。”这句话是相当辩证的，打破了二元论的桎梏。所谓“妇孺之言”，往往是对历史更为灵活而多元的解读乃至重构方式。所以石玉璞去世后，留下一对棺槨给自己和昭德，上面镌刻着“渔樵相对”。“渔樵”是一个象征，以日常之表谈古今兴亡之里，举重若轻。同时也说明一个在传统史观中纵横捭阖之人，对夫人